

多元而统一：《圣经·创世记》的游历叙事

陈智淦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英语系, 福建 漳州 363105)

【摘要】对《圣经·创世记》的游历叙事进行了考察,发现移动因素在《圣经》叙事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在卷首的《创世记》中,人物的移位是叙事者展示空间场景的一种重要手段,多样化的游历叙事增添了《创世记》的叙事艺术品质。这种游历叙事模式是一种类似线性的“永不回头”的运动,游历者在游历过程中会产生文化失落、文化固守等心理表征,希伯来精神内核正是在游历过程中造就的。

【关键词】《圣经·创世记》;游历叙事;移位;希伯来精神

【中图分类号】I1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804(2009)02-0107-06

《圣经》是浸润欧美文学不可或缺的两支重要伏流之一,但要“获得‘源头’的资格还必须有艺术成就作保证”^[1]。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圣经》在体裁、叙述结构等方面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从美学的观点来赏析其艺术特点是研究希伯来文学的新途径之一^[2],但对该书叙事艺术品质的研究却仍长期受冷落。《圣经》超过1/3的篇幅是由叙事构成的,这些叙事最具艺术品质,堪称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流珍品。它展现的是一个广阔的地理空间世界,众多事件经常与真实地名相联系,大多数故事不是发生在某个有限的地方,而是延伸到后来学者一致认同的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肥沃新月形地带”,即以以色列、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摩押、非利士等。

其实,游历或漂泊本是人类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母亲题。西蒙认为,“移动在《圣经》叙事中占有支配性地位”^{[3]207}。这种移动性在《创世记》中更是明显,即使在那些似乎处于静态的场景中,也存在着叙述者目光的移动^{[4]248}。《圣经》中这些流徙的意象原型对西方文学漂泊母题叙事强调生命意志、历险过程的特点的形成,无疑是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之源。^[5]因此,本文试以《创世记》为文本,着重考察《圣经》中所展现的多样化的游历叙事图景及其中所蕴含的统一的内在核心价值,这对西方的文学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前瞻性的作用。

一、多元：《圣经·创世记》展现的游历叙事类型

《创世记》是《圣经》66卷中的第一卷,也是前五卷书的引导书,除第1~11章是神话部分外,第12~50章是传说、史诗部分,描绘了希伯来民族的族长时代(约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这时代的希伯来人保持游牧半游牧的生活方式,这种传统是《创世记》游历叙事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

《圣经》故事都是在相当明确的时空框架中发生的,即使《创世记》的神话文本也留下了各种空间线索。比如,亚当、夏娃活动于“东方的伊甸园”(2:8)^①,该隐杀弟后被罚去“伊甸东边的‘流亡’之地”居住(4:16),大洪水过后挪亚的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8:4),众人在“示拿地的一片平原”建造巴别塔(11:2)。叙述者不但擅长通过叙事者目光的移动表现这种具体场景中的运

^① 所有《圣经》经文均参考《圣经新世界译本》1984年修订本,全文引用经文如没有特殊注明,均表示引自《创世记》。括号中的前、后两个数字,分别表示该引文在《圣经》中的章、节位置,下文同此。

【收稿日期】2009-03-11

【修回日期】2009-05-16

【作者简介】陈智淦(1979-),男,福建德化人,讲师,硕士,从事英美文学及圣经文学研究。

动,也善于描写各式各样的旅行^{[4]248}。人物的移位是叙事者展示空间场景的另一重要手段,《创世记》中的游历叙事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民族迁移

《创世记》中常有人物运动的明晰轨迹,但人物的旅行并非都是旅游。确切地说,《创世记》中多以行游或游历叙事为主。这里的行游是指范围更广的不以消闲度假为主旨的时空移动。《创世记》记载的主要是希伯来民族在族长时期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的转变过程,这是一段多次重大的民族迁移史,包括原始迁移,如因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而迁移(如罗德与亚伯兰的分离);被迫迁移,如国家或外力强制某些人迁移(如亚当、夏娃被迫迁出伊甸园,夏甲和其子以实玛利被逐旷野);还有自由迁移,这在《创世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自由迁移是指人以其自由意志为动力,选择了迁移的行动,以此来表现自我,或达成其理想^{[6]195},即为了改善生活而远赴他乡去奋斗。希伯来人的迁移不只是一次“行旅”,更是一次“迁居”,即他们进行的不只是在外一段旅行般的移动,更是真正移居他处定居。这从四位族长(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带领族人迁移的路线图即可看出,如亚伯拉罕从第12章的哈兰出发开始写起直到第20章卒于基拉耳,中间途经迦南地(示剑地摩利、伯特利)、南地,因饥荒到埃及,而后再折回南地、伯特利、伯特利和艾的中间、迦南、希伯伦幔利,最后又回到南地;其子以撒从第21章生于基拉耳开始写起直到第35章卒于基烈亚巴(希伯伦)结束,中间途经庇耳拉海莱、南地,又回庇耳拉海莱,后因饥荒到基拉耳,之后到基拉耳谷、别示巴等地。

族长时期希伯来人的生活属于半游牧半定居方式,他们因实际需要选择放牧或农耕,甚至既放牧又农耕。所以,希伯来人举族迁移的记载在《创世记》中屡见不鲜,正是这一民族生活特性使民族迁移的叙事成为可能,尤其是民族自由迁移叙事在《创世记》游历叙事文学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这四位族长,可谓四峰首尾相连,相互传承一种民族的信息,成为该书游历叙事最伟大的奇观。

2. 神游

除了旅行者身体的移动外,《创世记》中有一类行游是一种意念上的旅行活动,即“精神旅行”。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移动行为,神游涵盖的时空基本上处于一种抽象的状态^{[7]1-2}。

《创世记》的神游叙事集中表现为上帝和天使的巡游。所谓巡游,就是帝王对其所辖地区的视察,也称为“幸巡”,因为在旅行期间帝王访问其臣民被认为是一种恩赐。此类旅行名义上是统治者的视察,实则是统治者寻求个人观光历险的快乐和炫耀其权利与势力以满足其虚荣心的行游。随着伊甸园的建立,上帝成为天下最高权力的体现,他时而自己亲身现身;时而借助意象;时而派天使造访。因为他亲手缔造世界,并要许诺以色列民族实现种种预言,所以就借巡游以证明其世界权威及势力,从而实现了对以色列民族的精神统治。

同时,上帝的巡游也是一种劳作性旅游,子民必须作祭祀等活动,并“劳民伤财”式的大摆宴席以取悦其“幸巡”。如亚伯兰蒙上帝应许后,“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華筑了一座坛。”(12:7)当耶和華派三位天使来访亚伯拉罕时,他“…伏地下拜,说:‘…请容我拿点水来,你们好洗洗脚,在树下躺一会儿。…’”(18:2-5)“最后亚伯拉罕把奶油、奶和烹调好的牛犊肉拿来,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吃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直在树下,站在一旁侍候。”(18:8)“亚伯拉罕跟他们一起走,要送他们一程。”(18:16)第19章中罗得接待天使时也是如此。上帝或天使通过这样的旅行,既显示其统治力,又了解其臣民的忠诚程度。

3. 外交行游

《创世记》中也有一类特殊的“使游”,即游说旅行和外交旅行。外交使节旅行首次出现在第24章“以撒娶妻”的故事中。这名说客就是亚伯拉罕最老最忠诚的仆人,他奉主人之命出使美索不达米亚,到故乡哈兰替主人找适合的儿媳,最终完成了替主人的儿子以撒娶妻的使命,这位仆人算是《创世记》中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游说家。这次出使叙述虽极其简洁,“仆人从主人的骆驼里挑了十四骆驼,手里拿着主人各样的美物,起程往美索不达米亚,到拿鹤的城去。”(24:10)但是,这

次正式的“外交旅行”促成的家族联姻具有重要意义，利用通婚既促进了民族间的友谊，又形成了友好邻国间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传统。后来，以撒之子雅各也效仿，第28~29章中记载了雅各如何被迫出使外地并娶了母舅拉班的女儿利亚和拉结为妻的经历。

这样的外交行游也发生在人神之间。亚伯拉罕听从耶和华的意志高于一切，他为自己的正直和虔诚感到骄傲，耶和華决定再次考验他，于是就有了第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王昭君出塞，即汉元帝献上妃子以促进汉匈之间的民族关系的“和亲”故事。只不过王昭君自愿作“和亲婚姻”的参与者，利用通婚抵消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而以撒则是被动者，他只不过是在人神关系中被亚伯拉罕使用的一颗棋子，已达到建立人神关系互信的“战略”关系。这趟为期三天的沙漠之旅让亚伯拉罕为完成上帝的“指示”，这次“使命行游”最终让耶和華明白，亚伯拉罕是他所有信徒中最忠诚的一个，再也无需验证其虔诚程度了。这次“出使”对亚伯拉罕来说是成功的，从此他与上帝之间的互信关系得到了提升。

4. 军事行游

人物的运动历程在某些情况下也能成为情节的焦点和结构的主干，这就是追捕或追击故事的特征^{[4]249}。在多民族聚居的迦南地区，《创世记》中对军事旅行、军事远征的文字记载增加了这些军事行动的历史意义，这种描述是军事文化的特殊文学形式，它赋予军事旅行、远征新的意义，并且与以色列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由游牧业向农业过渡的时期，人们对于土地和家庭的依恋性很强，任何远行都被认为是对身体和情感的一种挑战、折磨，军事远行更是如此。雅各出逃惨象的细致描绘在以简约、含蓄为叙事特点的《创世记》中实属罕见。一方落荒而逃，惶惶如丧家之犬；“雅各瞒着叙利亚人拉班，没有告诉他就悄悄地走了。雅各带着他一切所有的逃走…”（31:20~21）一方则闻风而动，穷追不舍，“拉班马上带领众弟兄前去追赶，直追了七天的路程，在基列山区追上了。”（31:23）要不是上帝在拉班的梦境中显现加以“干涉”，一场战事在所难免。雅各带上妻妾子女和仆婢、牛羊，浩浩荡荡像支大军。当夜，他从牲畜中挑选了一部分作为送给哥哥的“赔礼”，“于是礼物先送了过去，雅各自己却留在营里过夜。”（32:21）战争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策略在雅各的军事旅行中上演了。

犹太人迁移自己的家园大多是出于上帝的“承诺”，也有的是出于天灾或人祸的缘故。古代犹太人和西亚各民族处在不断移动和斗争中，《创世记》第34章“底拿受辱”就记载了一桩因人而起的事，雅各女儿底拿貌美受玷污，雅各众子欺哄示剑，并率军杀尽示剑城男丁，财物妇孺被劫掠一空，故事令人触目惊心。上述民族间冲突、征战的情景构成了《创世记》的战争文化和文学文本，生动地展现了征战双方的士兵、普通百姓的苦难与悲痛，这也是古犹太民族游牧时代军事生活的生动写照。

5. 商贸行游

犹太人在经济领域内相当活跃，不论在本民族内部还是外部，都进行着密切的经济交往。所以，《创世记》还有一类以经济为目的的旅行，即“商务旅行”。犹太人很早就开始了多种贸易活动，最初是以牲畜和畜皮为等价物的物物交换。以经济为目的的旅行可以追溯到犹太民族的始祖亚伯拉罕侨居在基拉特时与基拉尔王亚米比勒所立的约，《创世记》第20~21章记载亚伯拉罕以七只母绵羊羔交换了井的所有权的经过。

后来随着货币的出现，交易过程逐渐简化，金银是牲畜以外的另一种等价物。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仑购买田地，他“…称了商人通用的银子四千六百克给他”（23:16），作为妻子撒拉的坟地；又如，雅各从阿拉米回到迦南后，“他用一百块钱从示剑的父亲哈抹的族人手上了搭帐幕的那块地，…”（33:19）由此可知，族长时代是一个交换等价物从牲畜向贵金属过渡的时期。

其实，商旅与军旅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都是“旅”而非“游”字。在古代，“旅”蕴含着额外艰辛，“游”则含有顺利之意^{[7]86}。犹太人按照一定的规则从事商品交换和财产转移，不断探索着经济交往的规律，在各种经济活动中获得丰富且行之有效的经验。以上的商贸活动也表明，他们不忌讳与外邦人的经济来往，因为经济交往能充分展露其独特精神，把自己推向世界；反过来，这种交往

也能刺激本民族经济的发展^[6]。

二、统一：《圣经·创世记》蕴含的希伯来精神

《圣经》的叙事者正是通过以上种种旅行图景，向读者呈现了一个极其广阔的叙事空间。从《创世记》里记载的五代人的游历路线，即第一代族长亚伯兰的父亲他拉的族人最早住在迦勒底的吾珥（两河流域的下游地区）（第11章），后来到了哈兰（两河流域的上游地区）（第11章），第三代族长雅各全家迁往埃及（尼罗河下游的歌珊地）（第46章），第四代族长约瑟卒于埃及（第50章），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大范围式的旅行记载尽管其间可能时有波折，但从整体上说，它不是一种回程式或双程式的运动。《圣经》这种游历叙事的典型模式不是一种环形运动，而一种类似线性的“永不回头”的运动。“游历者完全离开和超越原来的文明，目的在于寻找或建立另外一个文明。在这个旅程中，原来的文明在若干重要的方面被抛在后头，人从这一文明中迁移出来，以寻求某种精神上的解放。而只有当人们在‘新’精神的烛照之下超越或改变旧的生活方式时，这种解放才得以完成”^[9]，这种“新”精神就是经过了4 000余年的历史沉淀而延续至今的希伯来精神。西蒙曾说，“《圣经》叙事中满是迁移和运动，带给我们匆忙的人生”^{[3]217}。这一隽永的点评道破了移动因素与希伯来精神内核的“牵拉”纽带关系。

1. 游历与文化转移

《创世记》中记载的旅行一般都有现实需要，如朝圣、求亲、访友、经商或躲避战乱、逃避饥荒等，希伯来人常将旅行与危险联系起来。其实，人口和民族迁徙是历史上常见而影响深远的现象。《创世记》叙述了两种主要的移民迁移：一种是主动迁移，这样的人口迁移带来文化的转移；一种是被迫迁移，它往往带来文化的固守。《创世记》中民族迁移的叙事整体上的特征是：希伯来人的主动迁移是主干情节，被动迁移往往是次要情节或插曲。

从《创世记》第25章雅各出生于庇耳拉海莱到第49章死于埃及的记载中看出，雅各的“行游”是集主动迁移与被动迁移于一体的。雅各骗取了父亲以撒的祝福后，以扫恨之入骨，计划在父亲逝世后杀害他，母亲利百加怕兄弟相残，劝他去找舅舅拉班；从此雅各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徒步从迦南的南端别是巴出发，往两河流域的北端哈兰走去，雅各出逃可谓千里迢迢，风餐露宿，经过高山河谷，不怕跋涉之苦；到了拉班的家后，娶了拉班的女儿拉结、利亚及其她们各自的使女辟拉、悉帕为妻并生儿育女，并为拉班服役了14年；雅各为躲避以扫报复逃往美索布达米亚，20年后却又返回迦南；后来雅各因饥荒寄居在埃及达17年。在雅各的行游过程中，他可以在某地滞留很长时期，但至少观念上他们并不将其滞留地视为永久居住之地，尤其不认为那是自己的家乡与祖居地，在其死期临近时一再嘱咐子女要在他死后将他葬在其祖宗的埋葬之地，“我要归到祖宗那里去了。你们要把我葬在赫人以弗仑那块地上的洞里，跟我祖父在一起。”（49:29）

从雅各的“行游”可以看出，一方面自身原有文化的经验价值不能实现，使其行程缺乏一种安全感，上帝数次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许诺的“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的后裔子孙和“流着牛奶和蜂蜜的希望之乡”何时能兑现仍是一个未知数；另一方面在特殊环境里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盲目感。虽然“对犹太民族而言，一部民族史就是一部流浪史、一部旅行史”^{[7]100}，但是“当一个人从本土出发向另一地转移的时候，不仅是从已知地域向未知地域的地理转移，同时也是从一个熟悉的文化环境向另一个不熟悉的文化环境的文化转移”^{[7]140}。这种文化转移往往伴随着文化冲击，即由于时空转移而导致的一种文化失落感。《创世记》中对雅各数次被迫迁移前后的种种意外经历作了详尽的记述，就是行游者雅各心理产生的文化失落感的一种表征，这势必导致他对原文化的顽强固守和对异文化的非难和贬斥。换言之，雅各的思乡或怀旧情结是其文化固守的重要体现。

2. 游历与文化凝聚

希伯来人具有自己民族信仰，其行旅活动本身就隐含文化扩张的意义，带出的文化交流层面也更

宽、内涵更深。“在文化转移和迁徙中，当一方的原有文化尚不存在明显危机的时候，外来的文化因素经过有选择的吸收而被结合到原有文化之中，形成文化的增量”^{[7]130}。《创世记》里，数代希伯来人真正无畏地走在这跋涉不止的漂泊之途上，其民族精神的创造力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中保持长盛不衰、长流不腐，逐渐地形成了希伯来精神。

首先，它是一种“万众归一”的精神。“一”是指信奉唯一真神耶和华，他是犹太民族的上帝，也是世间各族的上帝。有了这个信仰，犹太人似乎全然忘掉自身的薄弱，而变成一个强大富有之族，可以步履坚定地走遍天下。这种精神在犹太民族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其信仰的坚定性上。在《创世记》的记载里，亚伯拉罕以信心著称。本来在繁荣富庶的吾珥城，过着舒适的生活，但后来随父来到哈兰，之后他终其余生过着游牧生活，居无定所，住在帐幕里。可是，圣经却说，“亚伯拉罕安享长寿，年老满足，断气死了。”(25:8)他并非只因一生的成就而深感满足，而是“亚伯拉罕因有信心，蒙召的时候就服从主命，离开家乡，到必得为业的地方去…”（《希伯来书》11:8）他一生满足，因为他跟造物主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其次，它是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数千年间犹太人一直在奔波流徙，不断追求新目标，开拓新生活，其间虽有封闭的一面，固执地排斥异己文化，同时也有开放的一面，善于吸收邻族的优点，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时时充实丰富自己，天长日久形成一种积极进取、勇于冒险的民族精神。比如，雅各前往舅舅拉班家时孤身一人，20年后返家时妻妾成群，子女满堂，牛羊骆驼浩浩荡荡；其子约瑟也被记叙为才智超群者，他在埃及当上宰相，地位仅次于法老，将一个庞大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们如果念念不忘已经离开的家乡，其实还有机会回去。不过他们尽力追求的是个更好的地方…”（来11:15~16）犹太民族在游历中形成的进取精神也传给她所孕育的初期基督教，对西方世界影响深远，如刘意青所说，“以《圣经》为代表的西方人到异地的长途跋涉都是有去无回的。就像亚伯拉罕定居迦南，他们旨在去开发和征服那片地方，是要占领那块福地。《圣经·创世记》那种要开发新地盘、寻找福地并据为己有的思想意识与美国的开国历史就特别具有可比性”^[10]。

再次，它是一种忍耐到底的精神。犹太民族除了进取冒险、主动进攻，倡导积极面向未来，敢拼敢拼，勇于开拓和创新之外，又有立足现实稳扎稳打的一面，讲求斗争策略，反对蛮干乱闯，主张不论陷于何种困境都要坚毅刚强，不屈不挠地坚持到最后一刻，即忍耐到底的精神。如第一代族长亚伯拉罕遵从了上帝的劝导“你要确实知道，你的苗裔要侨居外地，事奉当地的人。当地的人必苦待他们四百年。…到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里来…”（15:13~16）第三代族长雅各说，“我…一生侨居异地。我平生的岁月又短又苦，远不及我列祖在世侨居的岁月。”（47:9）这种忍耐到底的精神给犹太民族注入了罕见的坚韧性，使之在历史风云变幻中奇迹般地生存下来，直至今日。

总之，尽管“万众归一”的精神带有一定的唯心思想，这表现在其强烈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开拓进取”虽有开放性的一面，但似有文化扩张行为之嫌；“忍耐到底”又具有一定的宿命论色彩。但正如梁工所说，犹太民族最奇异之处或许正在于自身的各种矛盾性，封闭性保存了古老的犹太教，开放性创造了新生的基督教，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显示出希伯来精神的深广内涵和强劲生命力^[11]。精神的历史积淀与漂泊之途同时展开与延伸，精神的创造伟力就是这样在不断的流浪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超越，在希伯来文学中矗立起了一座历史的丰碑。

《创世记》记载的古希伯来人的迁徙既是生存空间的迁徙，也是文化环境的转换。上帝乃是迁徙者灵魂的居所，其漂泊本质上是精神的漂泊，其回归家园本质上也是精神的回归与追求，迁徙者的漂泊对生命而言是历险，但迁徙者却始终追寻着自己的精神养料，并倚仗它在异质的文化环境中漂泊把自身传统当作其内在之物，并不断在自我之中将传统向外界敞开。这样，在迁徙中潜在的生存危机与压迫最终形成了更强的精神动力，古希伯来人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由此促成。正是由于将上帝作为人类精神的家园，将人类的存在当作回归家园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以基督教文化精神（希伯来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学中游历或漂泊的表达与叙事是十分发达的，这在《创世记》得到了最完美的验证。

[参考文献]

- [1] 刘林. 新时期圣经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C] // 梁工, 卢龙光. 圣经与文学阐释.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155.
- [2] 朱维之. 希伯来文学研究的新途径 [C] // 张月起.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新发展.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 [3] 西蒙·巴埃弗拉特. 圣经的叙事艺术 [M]. 李锋,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4] 梁工. 圣经叙事艺术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5] 谭桂林. 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245
- [6] 龚鹏程. 游的精神文化史论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7] 郭少棠. 旅行: 跨文化想像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8] 梁工. 圣经时代的犹太社会与民俗 [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190.
- [9] 谢大卫. 圣书的子民: 基督教的特质和文本传统 [M]. 李毅,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中文版序 IX.
- [10] 刘意青. 略谈作为意识形态文本的《圣经·旧约》对西方思想、文化和政治的影响 [C] // 虞建华.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第3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11] 梁工, 赵复兴. 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99-100.

Diversity and Unity: the Narratives of Travel in *Genesis*

CHEN Zhi-gan

(English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 Kee College, Zhangzhou 363105, China)

Abstract: When delving into the narratives of travel in *Genesis*, the first book of Bible, we find that the element of movement 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the biblical narratives, especially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characters, which is one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narrator to display the space background in *Genesis*. Diverse narratives of travel intensify the artistic quality of narratives. The narrative of travel is generally a linear movement, in which the travelers produce the 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nostalgia and cultural adhesion. It is in the travel that the essence of brilliant Hebraism takes shape.

Key words: *Genesis*; narratives of travel; displacement; Hebraism